

一脉
1201 history book



史客

萨苏 主编

金城出版社

解玺璋
梁启超与胡适……左右不讨好的开路先锋

杨奎松
中条山战役「出兵」之争

余世存
梁家直道 盛产伟大人才的家教

萨苏
历史探秘之一：一个女兵，两张照片

连阳标

粤军大王



history meek

一脉

萨苏 主编

金城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史客·一脉 / 萨苏主编. — 北京: 金城出版社,

2012.2

(史客丛书)

ISBN 978-7-5155-0377-6

I . ①史… II . ①萨… III . ①中国历史: 近代史—文集

②中国历史: 现代史—文集 IV . ① K25-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018952 号

史客·一脉

作 者 萨苏

责任编辑 莫文

特约编辑 常昕

开 本 710 毫米 × 1000 毫米 1/16

印 张 17

字 数 240 千字

版 次 2012 年 2 月第 1 版 2012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印 刷 北京金瀑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书 号 ISBN 978-7-5155-0377-6

定 价 30.00 元

出版发行 **金城出版社** 北京市朝阳区和平街 11 区 37 号楼 邮编: 100013

发 行 部 (010) 84254364

编 辑 部 (010) 88637169

总 辑 室 (010) 64228516

网 址 www.jccb.com.cn

电子信箱 jinchengchuban@163.com

法律顾问 陈鹰律师事务所 (010) 64970501

编者的话

以历史深度阅读为使命,《史客》的编辑初衷便是带读者到历史中去做客。

《史客》的文章以中篇为主,几篇文章自成单元,既独立成篇,彼此之间又有一定联系。《左右为难的开路先锋》,胡适和梁启超在这里不必为难,因为我们既没有把他们放在左边,也没有把他们放在右边,而是把这篇解玺璋先生的大作放在了前面。

同样的梁启超,和孙中山一样,《英雄也怕病来磨》,罹患重病时却选择了当时为世人所疑虑的西医,是不是大英雄也有盲目崇洋的时候?梁启超和朱启钤是同代人,看似一个意见领袖,一个文人政客,彼此境界不同,其实渊源很深。没有朱启钤,就没有营造学社,就没有梁启超之子梁思成一代建筑大家的成就。叶观澜不专讲梁启超和朱启钤,而是以一个军火商映衬朱启钤的人生、人格。而这一个单元最后柴静的一篇短文《一百年前的领导干部》,灵动的文字点亮了一段历史,也让整个单元重新回到了朱梁之间的关系脉络。

从这个单元的文章,大体也可以看出《史客》的风格。其后的第二个单元中,余世存的家族系列写出了中国传统家族的精神血脉。网络作者连阳标统带着浓郁的粤味儿,演绎了这个靠地域文化维系,以张发奎为核心的粤系军阀形成的历史脉络。一个“脉”字,点染着历史深处的一点绵绵不绝。

第三个单元我们集中选用了两篇关于抗战的文章,杨奎松先生中条山一文,其对历史的态度和学术风格一如既往地感染了我们。而来自萨苏周围,活跃于网络的几位可爱可敬的历史爱好者,他们关于冯庸大学女子义勇军的一番追踪探秘,更是让人怦然心动。希望这些史料、见识和语言都比较新颖的文字,给我们看到这场战争的异样侧面。

第四个单元锁定了辛亥,但又没有去关注袁世凯、段祺瑞,甚至载沣、铁良

这样的百年热点，而是选取了我们不甚熟悉的张振武、沈佩贞、川岛浪速和荷马李。他们并非显赫人物，但他们的命运同样折射了那个时代。

第五个单元，我们选择了一篇世界史的文章，那是关于早期纳粹党内部因权力角逐自相残杀的一段内幕。希望读者能够在阅读中国近代史的诸多文字之后，做一个小小的调剂，也算是一个尝试。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白发渔樵江渚上，惯看秋月春风。一壶浊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

《史客》的谐音是“时刻”，希望我们的努力，能够带读者到那一个个令人热血沸腾或者值得思索的时刻，重温历史的片段，则心愿已偿。

限于编辑水平和能力，选择的主题又多是历史中鲜为人知的内容，这样一本历史图书中难免错漏疏失，尚请广大读者原谅和指正，以为对我们的鞭策。

编者

2012年2月11日

史 客

目 录

解玺璋	梁启超与胡适：左右不讨好的开路先锋	1
京虎子	英雄也怕病来磨	24
叶观澜	朱启铃与雍剑秋：交通系大佬与军火贩子	33
柴 静	一百年前的领导干部	46
余世存	梁家直道	61
	盛产伟大人才的家教	70
连阳标统	粤军大王：上山虎张发奎	79
	广东名人绰号谈	129
陈郢客	那一个风花雪月的时代·圈子内外	134
杨奎松	中条山战役“出兵”之争	159
萨 苏	一个女兵，两张照片	176
春秋的老胡	由一张“女子义勇军照片”引出的几段史实	182

萨 苏	被当作“女流氓”的女子炸弹队长——沈佩贞	202
雪 珥	“草莽革命家”张振武	207
萨 苏	日本浪人川岛浪速	217
雪 珥	东瀛虬髯客——宫崎滔天	225
雪 珥	美国浪人荷马李	235
史 鉴	长刀之夜	246

梁启超与胡适：左右不讨好的开路先锋

胡适祖籍是安徽的绩溪，光绪十七年（1891）十一月初十生于上海。他的祖上是个小茶叶商，到他父亲这一代，已经成为官宦之家。他的母亲是父亲的第三房妻子，17岁时嫁给了47岁在外做官的父亲。他是母亲唯一的孩子，却是父亲的第七个孩子，他有三个哥哥，三个姐姐，其中二哥胡绍之对他帮助最大。

梁启超与胡适是两代人。胡的母亲和梁启超同岁。光绪十五年己丑（1889），胡适出生的前两年，梁启超已经中了举人。光绪十七年辛卯（1891）十月，9岁的梁启超到北京与李端蕙完婚。这时的梁启超已经经历了“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两大人生美事，正是春风得意的时候。大约两个月后，胡适才呱呱坠地，来到人间。

13岁以前，胡适在家乡读书，除了传统的蒙学课本，还读了一些经书和史书，也读了一些当时的白话小说。13岁那年，他带着一肚子线装的旧书，离开家乡，来到上海。那是光绪三十年甲辰（1904），那时的梁启超，自戊戌变法失败，流亡日本，已有六年，他创办的《新民丛报》，也已挂牌两年，他那充满激情和魔力，且明白晓畅的文字，正风行于华夏，激荡着国人的一腔热血，他也被人们看作是舆论界的骄子和明星。

胡适初到上海，入的是家乡人办的梅溪学堂。在这里，他第一次读到了梁启超写的文章。当时的情形很有些机缘巧合。据说，入学之初，他被编入小学第五班，差不多算是该校最低的一级。但由于他此前有过九年的乡村教育，积

累了一定的旧学知识，渐渐为老师所赏识，“一天之中升了四班，居然做第二班的学生了”。（胡适：《胡适自传》，43页）胡适为此很有些自得，但当天的作业却让他为了难。这一天恰是作文的日子，黑板上赫然写着两个题目：

论题：原日本之所由强。

经义题：古之为关也将以御暴，今之为关也将以为暴。

当年的胡适并不知道“经义”该怎样做，所以连想也没敢想。而“论题”总是可以的吧？但他却连日本究竟在哪里还搞不清楚，又怎能论“日本之所由强”呢？也是天无绝人之路，就在他一筹莫展的时候，二哥来了。于是，他赶紧求助于二哥，“二哥检了《明治维新三十年史》、壬寅《新民丛报汇编》一类的书，装了一大篮，叫我带回学堂去翻看。费了几天的工夫，才勉强凑了一篇论说交进去”。（胡适：《四十自述》，43 - 44页）在这里，梁启超显然给了胡适很大帮助，这个帮助主要的还不是作了一篇论说，而是实现了他人生中最重要的一次转折。有点像当年梁启超第一次到上海，得到很多上海制造局翻译的西书，使他对新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胡适也是这样，梁启超的书在他肚子里一经发酵，便使他“转到了旧书堆以外的新世界”。（李敖：《胡适评传》，91页）他不仅学会了许多新名词，而且，索性就以“新人物”自居了。他后来回忆起当时的情景：“二哥给我的一大篮子的‘新书’，其中很多是梁启超先生一派人的著述，这时代是梁先生的文章最有势力的时代，他虽不曾明白提倡种族革命，却在一班少年人的脑海里种下了不少革命种子。”（胡适：《四十自述》，44页）

胡适就是这班少年中的一个佼佼者。他后来不肯“投到官厅去考试”，从此断了科举的念头，也是由于梁启超的影响所在。为此，他离开梅溪学堂，进了澄衷学堂，而且，把“梁启超”也带来了。在澄衷一年半，他陆续读了梁启超许多文章，也读了严复译的《天演论》和《群己权界论》。在《四十自述》中他这样写道：

严先生的文字太古雅，所以少年人受他的影响没有梁启超的影响大。梁先生的文章，明白晓畅之中，带着浓挚的热情，使读的人不能不跟着他走，不能不跟着他想。有时候，我们跟他走到一点上，还想望前走，他倒打住了，或是换了方向走了。在这种时候，我们不免感觉一点失望。但这种失

望也正是他的大恩惠。因为他尽了他的能力，把我们带到了一个境界，原指望我们感觉不满足，原指望我们更朝前走。跟着他走，我们固然得感谢他；他引起了我们的好奇心，指着一个未知的世界叫我们自己去探寻，我们更得感谢他。（同上，47页）

他告诉我们：

我个人受了梁先生无穷的恩惠。现在追想起来，有两点最分明。第一是他的《新民说》，第二是他的《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梁先生自号“中国之新民”，又号“新民子”，他的杂志也叫做《新民丛报》，可见他的全副心思贯注在这一点。“新民”的意义是要改造中国的民族，要把这老大的病夫民族改造成一个新鲜活泼的民族。”（同上，47页）

他在引述了几段梁启超的议论之后越发感慨地表示：

我们在那个时代读这样的文字，没有一个人不受他的震荡感动的。他在那时代（我那时读的是他在壬寅（1902）癸卯（1903）做的文字）主张最激烈，态度最鲜明，感人的力量也最深刻。他很明白的提出一个革命的口号：“破坏亦破坏，不破坏亦破坏！”后来他虽然不坚持这个态度了，而许多少年人冲上前去，可不肯缩回来了。（同上，48页）

从梁启超的通俗文字中，他渐渐知道了霍布斯、笛卡儿、卢梭、边沁、康德、达尔文等西方思想家。而最让他感佩的，是梁在当时就有胆量说出中国人不如西方人的话，他很不客气地指出，“中国民族缺乏西洋民族的许多美德”（同上，49页），比如公德、国家思想、进取冒险、权利思想、自由、自治、进步、自尊、合群、生利的能力、毅力、义务思想、尚武、私德、政治能力等等。胡适以一种赞赏的口吻说：

他在这十几篇文字（指《新民说》）里，抱着满腔的血诚，怀着无限的信心，用他那枝“笔锋常带情感”的健笔，指挥那无数的历史例证，组织成那些能使人鼓舞，使人掉泪，使人感激奋发的文章。其中如《论毅力》

等篇，我在二十五年后重读，还感觉到他的魔力。何况在我十几岁最容易受感动的时期呢？（同上，49页）

他承认：

就是这几篇文字猛力把我以我们古旧文明为自足，除战争的武器，商业转运的工具外，没有什么要向西方求学的这种安乐梦中，震醒出来。它们开了给我，也就好像开了给几千几百别的人一样，对于世界整个的新眼界。（胡适：《我的信仰》，89页）

而梁启超的《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用历史的眼光整理中国旧学术思想，也给了胡适新的见解和启发，使他知道了在“《四书》、《五经》之外中国还有学术思想”。然而不幸的是，这部规模宏大的著作，“梁先生做了几章之后，忽然停止了，使我大失望。甲辰（1904年）以后，我在《新民丛报》上见他续作此篇，我高兴极了。但我读了这篇长文，终感觉不少的失望。第一，他论‘全盛时代’，说了几万字的绪论，却把‘本论’（论诸家学说之根据及其长短得失）全搁下了，只注了一个‘缺’字。他后来只补作了‘子墨子学说’一篇，其余各家始终没有补。第二，‘佛学时代’一章的本论一节也全没有做。第三，他把第六个时代（宋、元、明）整个搁起不提。这一部学术思想史中间缺了三个最要紧的部分，使我眼巴巴的望了几年。我在那失望的时期，自己忽发野心，心想：‘我将来若能替梁任公先生补作这几章缺了的中国学术思想史，岂不是很光荣的事业’？”（胡适：《四十自述》，50页）他后来写作《中国哲学史大纲》，就是把“这一



梁启超对胡适的影响是多么重大，这种影响成了胡适“日后思想的滥觞，平生所学的抉择，终身兴趣的所在”。——李敖

点野心”当作种子，埋藏在心里，慢慢长成了一株参天大树。

很显然，在梁启超与胡适的关系中，始终存在着一种承前启后的关系。青少年时代的胡适是把梁启超当作精神、学术方面的导师或引路人的。从以上的叙述便可以看出，“梁启超对胡适的影响是多么重大，这种影响成了胡适‘日后思想的滥觞，平生所学的抉择，终身兴趣的所在’，无怪乎在十多年后，胡适要写信给梁启超，要去天津拜访他，‘以慰平生渴思之怀’了”。（李敖：《胡适评传》，96页）

虽然胡适一直很仰慕梁启超，但至少在1918年11月以前，他们无缘相见。胡适考取庚款留美官费生，入美国康奈尔大学留学，是在宣统二年（1910年7月）间，此时梁启超还在日本过着他的流亡生活。1912年10月，梁启超启程回国，而胡适却正在康奈尔准备做他的农学家。尔后，他先转入该校文理学院，主修西方哲学；1915年10月，又往哥伦比亚（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就学于杜威教授。这期间，他对活跃于国内的梁启超仍十分关注。1912年11月初，他读了国内报纸对梁启超结束流亡生活、从日本回国的报道，在《日记》中写道：

阅报时，知梁任公归国，京津人士都欢迎之，读之深叹公道之尚在人心也。梁任公为吾国革命第一大功臣，其功在革新吾国之思想界。十五年来，吾国人士所以稍知民族思想主义及世界大势者，皆梁氏之赐，此百喙所不能诬也。去年武汉革命，所以能一举而全国响应者，民族思想政治思想入人已深，故势如破竹耳。使无梁氏之笔，虽有百十孙中山、黄克强，岂能成功如此之速耶！近人诗“文字收功日，全球革命时”，此二语唯梁氏可以当之无愧。（耿云志：《胡适年谱》，25页）

在这里，他对梁氏的颂扬或许有些过分，但其所说，却也有很大部分是实话。他很关注梁启超的学术动向，1916年在美期间，还写了《驳梁任公〈管子〉》和《评梁任公〈中国法理学发达史论〉》等文章，认为他的研究“有足取者”，亦有谬误。这时的胡适已经不是十几年前的少年，经过七年的留学美国，不仅眼界大开，而且，接受了欧美最新的文、史、哲的思想学术训练，掌握了新的研究方法。特别是1917年初，他的《文学改良刍议》一文发表于《新青年》二卷五号上，吹响了文学革命的第一声号角，他也俨然成为中国思想文化界的一颗新

星。这一年的6月，他离开美国，取道温哥华途径日本回到上海，时为7月10日，陈独秀正打算专程到上海见他。9月，他即应蔡元培的邀请，出任北京大学教授，讲授“中国古代哲学史”。于是，胡适与梁启超会面的机会也就来了。

到北京的第二年，1918年11月，胡适动了要见梁启超的念头。此时的他正在研究墨子哲学，这是个很好的理由，因为他知道，梁启超也在研究墨子，且很有心得。他先请好友徐振飞（新六）致信梁启超，徐在11月7日给梁启超的信中说：

任公年丈总长：胡适之先生现任北京大学掌教，主撰《新青年》杂志，其文章学问久为钧座所知，兹有津门之行，颇拟造访，敢晋一言，以当介绍。（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872页）

为表示郑重其事，胡适在赴津前两日（11月20日），又专门写信致梁任公，表明拜访的意思：

任公先生有道：秋初晤徐振飞先生，知拙著《墨家哲学》颇蒙先生嘉许，徐先生并言先生有墨学材料甚多，愿出以见示。适近作《墨辨新诂》，尚未脱稿，极思一见先生所集材料，惟彼时适先生有吐血之恙，故未敢通书左右，近闻贵恙已愈，又时于《国民公报》中奉读大著，知先生近来已复理文字旧业，适后日（十一月二十二日）将来天津南开学校演说，拟留津一日，甚思假此机会趋谒先生，一以慰生平渴思之怀，一以便面承先生关于墨学之教诲，倘蒙赐观所集墨学材料，尤所感谢。适亦知先生近为欧战和议问题操心，或未必有余暇接见生客，故乞振飞先生为之介绍，拟于二十三日（星期六）上午十一时趋访先生，作二十分钟之谈话，不知先生能许之否？适到津后，当再以电话达尊宅，取进止。（同上，872—873页）

胡适初次会晤梁启超的时间，被认为是1918年11月23日，地点就在天津梁启超的私宅。几乎所有人都言之凿凿，丁文江、赵丰田合编的《梁启超年谱长编》，以及胡颂平编撰的《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采用的也是这种说法。其根据就是徐振飞与胡适这两封《致任公先生书》。2004年9月，余英时作《从〈日记〉看胡适的一生》一文，其中提到了胡适的《日程与日记》，在1920年

3月21日的日记中有如下记载：

宗孟（即林长民）饭，初见梁任公，谈。

余英时先生说：“这是胡适当天亲笔所记，应该最可信。”（余英时：《重寻胡适历程》，15页）巧的是，梁启超这时恰在北京。梁启超于1918年12月启程赴欧洲考察，于1920年1月22日由马赛乘法国邮轮归国，3月5日抵达上海，19日到达北京，24日返回天津。他在25日写给女儿思顺的信中提到“入都”一事，说是“向当道循例一周旋”（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903页），即谒见大总统徐世昌，汇报旅欧的经历。朋友自然也是要见的，林长民（宗孟）更是非见不可。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是多年的老朋友，后来的儿女亲家。这次梁启超赴欧，以私人资格参与巴黎和会，在世界舆论面前为中国申诉其权利，在国内与他遥相呼应的，就是林长民。当他得知北洋政府与日本政府关于山东问题的密约将影响中国在巴黎和会收回山东主权的消息后，第一个打电报给林长民，才有了5月2日《晨报》上林长民所作《山东亡矣》一文，并成为“五四”运动的直接导火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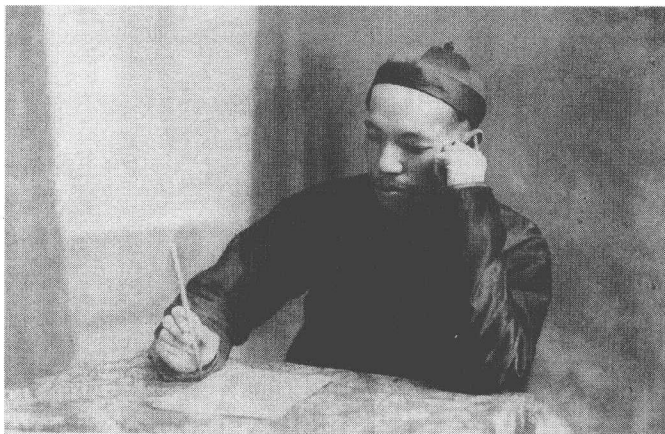
时隔半年多，梁启超回到北京，林长民组织个饭局，为老朋友接风洗尘，应该是很自然的事。而胡适被邀请出席这个饭局，也自有一番道理。我们知道，梁启超赴欧之前，胡适曾致书请求一见，也许当时任公先生行程紧张，当天有事，未及与胡适见面，那么，现在旅欧归来，恰好可以弥补先前的遗憾。而胡适当时未能见到梁启超，也许还有他自己的原因。1918年11月23日，即他约好与梁启超见面那天，母亲突然病逝，消息传来，或使得他不得不放弃原来的计划。

旅欧归来的梁启超是很愿意主动与胡适来往的。据胡适《日程与日记》1920年8月27日记载：“梁伯强（梁善济，字伯强，立宪派元老）家饭，有梁任公、蓝志先、蒋百里等。任公谈主张宪法三大纲。……他很想我们加入发表，我婉辞谢之。”（耿云志编：《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第14册，359页）这是见于记载的数月之后的又一次饭局，可见当时梁启超与胡适多有交往和交流，一起吃饭的机会很多。梁启超是个很少成见的人，既然他很想在新的时代有所作为，就不能不联络新的同志。但新的同志对他这个老牌立宪党人、研究系的首领却不能不有所警觉。胡适曾说过“二十年不谈政治”，这也许是他拒绝梁启超的邀请，一起搞什么制宪运动的原因之一。但这些并不妨碍他们继续交往，政治谈不到

一起还可以谈学术。这一年的10月18日，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脱稿之后，给胡适写了一封信：

公前责以宜为今文学运动之记述，归即囑稿，通论清代学术，正宜钞一副本，专乞公评鹭。得百里书，知公已见矣。关于此问题资料，公所知当比我尤多，见解亦必多独到处，极欲得公一长函为之批评（亦以此要求百里），既以裨益我，且使读者增一层兴味，若公病体未平复，则不敢请，倘可以从事笔墨，望弗吝教。超对于白话诗问题，稍有意见，顷正作一文，二三日内可成，亦欲与公上下其议论。对于公之《哲学史纲》，欲批评者甚多，稍闲当鼓勇致公一长函，但恐又似此文下笔不能自休耳。（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922页）

梁启超信中所说“通论清代学术”一书，即《清代学术概论》。此书的缘起，本来是其学生兼朋友蒋百里请他为自己所著《欧洲文艺复兴时代史》作一篇序，但如其所述：“既而下笔不能自休，遂成数万言，篇幅几与原书埒。天下古今，固无此等序文。脱稿后，只得对于蒋书宣告独立矣。”（《清代学术概论》自序）也就是说，他把一篇序文写成了一部书，此等事也许只有梁启超才能做得出。但他在这里又说是受到胡适的嘱托，要他写出晚清“今文学运动”的亲历，而他也为此所打动，于是才有了这篇篇幅虽短却令人惊叹的天才著述。胡适是否有过类似的建议，并不重要，梁启超这样说，一是要在后学面前表示谦虚，再



梁启超与胡适的交往和友谊，最初是靠了他们二人对于《墨子》的共同兴趣。

有便是和胡适套近乎。所以，他在将此稿交给蒋百里连载于《改造》杂志的同时，又寄交张元济主持的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单行本，并钞成副本，请几位朋友“评鹭”，这其中就有胡适。其后再版，他在序文中特意说明，新增加的三个小节和改正的数十处，就吸收了胡适等人的意见。胡适在1921年5月2日的日记也记下了此事：

车中读梁任公先生的《清代学术概论》。此书的原稿，我先见过，当时曾把我的意见写给任公，后来任公略有所补正。《改造》登出之稿之后半已与原稿不同，此次付印，另加惠栋一章，戴氏后学一章，章炳麟一章，皆原稿所无。此外，如毛西河一节，略有褒辞；袁枚一节全删；姚际恒与崔适的加入，皆是我的意见。任公此书甚好，今日亦只有他能作这样聪明的著述。（胡适：《胡适文集》书信日记卷，99—100页）

不久，梁启超又有了一次与胡适在学术上交往的机会。1921年初，梁启超将他十余年来研究《墨子》的成果，写成了《墨经校释》一书，并致信胡适，希望他能为此书作一篇序文。胡适见了梁启超的书，“心里又惭愧，又欢喜”，惭愧的是，“我曾发愿，要做一部《墨辩新诂》，不料六七年来，这书还没有写定”；欢喜的是，现在有了“梁先生这部校释”，而且，梁先生“这里面很有许多新颖的校改，很可供治墨学的人的参考”。（胡适《墨经校释后序》，载梁启超：《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三十八，99页）

胡适的墨学研究在20世纪独树一帜，在近现代墨学复兴过程中占据着特殊的地位。但他能后来居上，不能不认为梁启超有启蒙之功。胡适在《墨经校释序》中写道：

梁先生在差不多二十年前就提倡墨家的学说了。他在《新民丛报》里曾有许多关于墨学的文章，在当时曾引起了许多人对于墨学的新兴趣，我自己便是那许多人中的一个人。（同上，99页）

在这里，他把自己对于墨子学说的兴趣以及最初的研究动力，全部归结为梁启超的示范、引领和启发。其实，梁启超注意到墨子的学说，还可以追溯到更早的求学时期。那是1893年（光绪十九年癸巳），孙诒让写定《墨子闲诂》，

第二年，印成三百部，分送给各位朋友“审读”。梁启超回忆当时的情景：“承仲容（孙诒让字）先生寄我一部，我才二十三岁耳。我生平治墨学及读周秦子书之兴味，皆自此书导之。”（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284页）这是20年后梁启超写作《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时附带提到的，他对孙诒让的墨学研究大为赞赏，认为：“仲容则诸法并用，识胆两皆绝伦，故能成此不朽之作……盖自此书出，然后墨子人人可读，现代墨学复活，全由此书导之，古今注墨子者莫能过此书。”（同上，283 - 284页）梁启超这番话说得不错。与后来梁启超和胡适对墨子的研究相比，孙诒让“用力虽勤，而所闻仍寡”，这是因为“比年以来，欧学东注，学者凭借新知以商量旧学，益觉此六千言者，所函义浩无涯矣”。（《墨经校释》自序，梁启超：《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三十八，2页）梁启超和胡适用西方思想方法研究、解释《墨经》，固然可以有进一步的创建，并为墨学研究开拓新的局面，但孙诒让里程碑式的基础工作，却是谁都不能否认的。直到1998年中华书局重印此书，孙启治在《前言》仍然认为，就《墨子》学说的研究成果而言，“近代著作无一不是在孙书的基础上完成的”。

如果说，梁启超治墨学的兴趣最初源自孙诒让，而胡适治墨学的兴趣又来自梁启超的话，那么，可以想见，梁启超与胡适的交往和友谊，最初正是靠了他们二人对于《墨子》的共同兴趣。我们还记得，几年前，胡适通过徐振飞提出想要拜见梁启超的时候，就是因为他的《墨家哲学》受到了梁启超的称赞，而且，梁启超还表示，愿意与后学分享他所珍藏的墨学材料。如今，他的新著要出版了，他不仅致信胡适，希望能为该书做一篇序，并且希望他不客气地在序里“是正其讹谬”。这里不排除梁启超的“客气”，但也能看出胡适在他心中的分量，他是很推重胡适的。胡适自然不敢怠慢，他既要投桃报李，惺惺相惜，又表示：“他这样的虚心与厚意，使我不敢做一篇仅仅应酬的序。”（胡适《墨经校释后序》，载《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三十八，99页）

胡适很认真也很不客气地写了一篇序文，对梁启超所采用的校勘学方法提出了质疑和批评。这本来应该是现代学术史上的一段佳话，但此时梁启超的做法，却显得过于小气。原本是他让人家“正其讹谬”的，人家一当真，直言了几句，是他没有想到的，不免就有点耿耿于怀。书印出来以后，他把自序放在卷首，却把胡适的序文放在了书后，这已经不够礼貌了，而更觉不妥的是，他将《复胡适之书》作为附录缀于《读墨经余记》之后，却不刊用胡适的答书。这些不近人情的举动让胡适很不高兴，他多次和朋友提起此事，认为梁启超心胸狭窄，